

中东欧国家周报

【克罗地亚社会周报】

2019年克罗地亚社会发展回顾：人权保护的衰弱

Nikica Kolar

(2019年12月)

Kiadó: Kína-KKE Intézet Nonprofit Kft.

Szerkesztésért felelős személy: Chen Xin

Kiadásért felelős személy: Huang Ping



【克罗地亚】2019 年克罗地亚社会发展回顾：人权保护的衰弱

摘要

2019 年，克罗地亚社会对女性和少数民族的仇恨事件增多，但是亦有反抗这种仇恨情绪的声音。2019 年，厌恶女性和民族主义的表现方式极具攻击性。这一年，在暴力侵害女性事件中，最著名的例子是扎达尔的一名少女遭受多次强奸，因而部分公众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免受家庭暴力，自发组织了新的协会、提出新的倡议，并组织了抗议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此外，民族沙文主义（nationalist chauvinism）也非常突出（针对塞族人和吉普赛人），以致主流媒体都不能忽视此事。塞族国民理事会（Serbian National Council）多次组织竞选运动和行动，提高公众意识，反对歧视克罗地亚塞族社区。遗憾的是，总统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禁止媒体报道有关保护克罗地亚境内塞族人和吉普赛人人权的问题，加剧了仇视他人的民族主义言论。保护人权再次被克罗地亚政治领导人置于脑后。

引言

人权保护问题反映了克罗地亚的真实情况。2019 年，出现了一些针对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的仇恨言论和暴力事件，而国家机构未能履行保护这些群体人权的职责。此外，一些机构（主要是法院和社会福利中心）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人权侵犯者，而不是受害者的利益。历史修正主义在克罗地亚社会和政治中无处不在，使得政治仇恨言论泛滥。历史修正主义意在恢复仇恨和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即克罗地亚纳粹主义至上。在大多数吉普赛人定居的 Međimurje 区域，吉普赛人受到仇外情绪和种族主义的极大打击。此外，水球运动员在斯普利特（Split）的塞族红星俱乐部

受到袭击、布拉奇岛（Brač）的塞族工人遭受攻击，以及在塞族政党竞选海报上涂上反塞族法西斯标志，都是主流媒体不能忽视的仇恨事件。这些只是克罗地亚境内塞族社区日常生活中发生事件的一小部分。政府和总统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或者只是重复这样一句话，即：政府机构必须主动履行其职责，因为在总统选举年涉及保守且民族主义社会的沙文主义太过冒险。

仇视女性：骇人听闻的家庭暴力案件

作为国家社会机构无能的体现，Pag 惨案将会永远铭刻在克罗地亚社会的记忆中。2 月底，Josip Rođak（54 岁）将 4 个年幼的孩子扔出阳台。Rođak 一家长期在当地社会福利中心的监管之下，但社会服务部门未能及时介入。坠楼的孩子幸存下来，但他们的心理健康将会受到持久的影响。在本案中，防止功能缺失家庭发生冲突的机构完全没有起到作用。Pag 事件令公众非常愤怒，以至于一些公民共同提出了“拯救我”的新倡议，向国家机构施加压力，并直接要求政府改革体制，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市民的抗议成功迫使政府开始改革福利制度，但只是改革了部分社会保障制度。

10 月初，又发生了一个男性施暴力事件，使公众感到恐惧。在扎达尔，5 名 17—19 岁的年轻男子集体强奸了 1 名 14 岁的女孩，时间长达一年半。他们在强奸期间对她进行拍摄，如果她不允许，就会再次对她进行性虐待，并以向公众公开照片相威胁。扎达尔刑事法院法官伊万·马尔科维奇（Ivan Marković）对这些暴行的判决竟然是释放这些嫌疑人，让他们在保释期间为自己辩护。该机构再次未能保护女性免受虐待，令使公众极为愤怒。因此，国家政府机构必须立即作出反应，再次拘留涉嫌的所有年轻男子。在社交网络上，政府机构不能维护正义的无能表现被广泛传播，致使民众自己伸张正义，报复那些对女孩犯下强奸罪的年轻人。在法官决定拘押嫌

犯后不久，克罗地亚各地发生了大规模的民间抗议活动。抗议活动期间的许多信息表明，克罗地亚社会不再接受父权至上和厌恶女性的行为。

针对少数民族的仇恨：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塞族人和吉普赛人

30 年来，在所有的坏事中，塞族人一直是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的主要替罪羊。距离上次与塞尔维亚的战争已有几十年了，但克罗地亚对塞族区域的仇恨一直存在，仿佛战争从未结束。2019 年初，塞尔维亚水球运动员访问斯普利特时，这种仇恨就表现出来了。一些流氓袭击了塞尔维亚红星俱乐部的水球运动员，用铁棍迫使他们跳入大海逃跑。这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反复出现的规律性事件。几个月后，布拉奇岛上的季节性塞族工人遭到袭击。20 个流氓袭击了一群男女，质问谁是塞族人。布拉奇事件发生 2 个月后，在克宁（Knin）附近的 Uzdolje 小村庄，一家咖啡馆遭到流氓袭击，因为顾客经常在这家咖啡馆观看塞尔维亚足球比赛。这些流氓殴打咖啡馆里的每个人，包括西欧公民。因为这次涉及攻击欧盟国家公民，当局不得不做出反应。袭击者被逮捕，但主要政客发表的反塞族言论仍然存在。但反常的是，一些主要的民族主义政客却为 Uzdolje 村庄事件指责克罗地亚塞族民主政党（SDSS）。

对吉普赛人的仇外心理也表现出来。仇恨意识有逐渐恢复的趋势，比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产生的克罗地亚纳粹主义等，因此为针对另一种族成员的抗议活动提供了机会和空间。在这种情况下，吉普赛人是克罗地亚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理想针对目标。在查科韦茨，Međimurje 公民经常选择自由派政客担任地方政府职务，还组织了一次针对吉普赛人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这次抗议活动基于明确的种族主义和含蓄的法西斯意识。传统上，吉普赛人是克罗地亚社会最边缘化的群体，而抗议者要求进一步边缘化吉普赛人，将他们与正常的克罗地亚社会分离。在抗议活动中，吉普赛人被视为十足的、真

正的罪犯，而克罗地亚人是正常而可敬的人。现在，种族仇恨（针对其他人、少数民族和完全不相干的人）的种子已经播下，然而执政者没有作出任何回应。

结论

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国家预算的财政整顿还是公共债务的偿还，2019年克罗地亚整个社会都在分崩离析。在经济方面，最明显的表现是在人口统计方面，主要是当地人口的高移民率和不稳定的养老金制度；在社会方面，表现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仇恨日益加深。尽管随着经济自由的实现，女性越来越多地进入公共领域，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回流迫使她们重新回到全职家务劳动的传统角色中。当这些性别角色得不到履行时，男性暴力就会以最恶劣的方式变得咄咄逼人。克罗地亚社会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现在感受到了这场文化危机的后果。这场文化危机将社会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希望回到神话般的黄金时代，那个时代女性的角色是固定的；另一部分人则希望维护和扩大对女性的解放，和男性一样享受自由和平等。克罗地亚社会在这个问题上正处于十字路口。在种族平等和民族身份平等方面，克罗地亚社会在未来有更长的路要走，人人平等比女性解放更难以实现。传统仇外心理助长了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又助长了现代仇外心理。只要目前的克罗地亚政治集团掌权，就不可能摆脱这种恶性循环。因为执政者显然是理智的行为者，他们会把自己塑造成真正能代表（基于共有种族和民族身份的）普通人和多数人的形象，这符合他们的利益。除此之外，执政者与普通人没有其他的共同身份。因此，他们向克罗地亚社会中的同类人和同族人不断传播仇恨意识形态，这是他们未来继续执政的保障。

（作者：Nikica Kolar；翻译：梁方圆；校对：郎加泽仁；审核：刘绯）